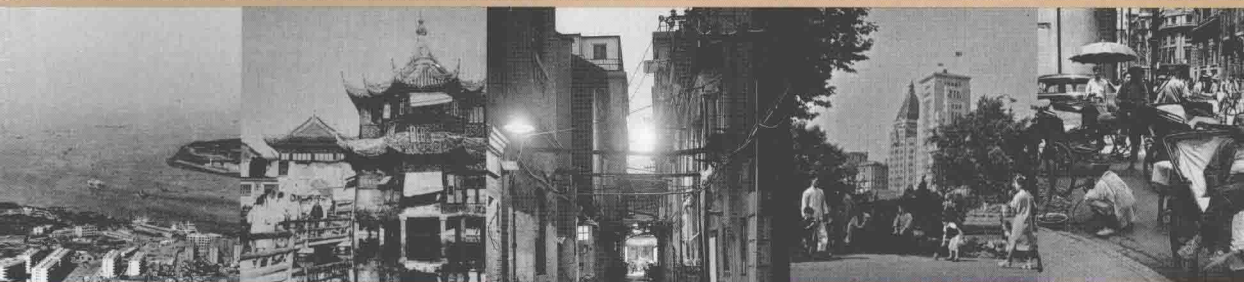




上海史

《走向现代之路》



【法】白吉尔 著
王菊 赵念国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史

《走向现代之路》

【法】白吉尔 著
王 菊 赵念国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 / (法) 白吉尔著；王菊，赵念国译.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528-8

I. ① 上… II. ① 白… ② 王… ③ 赵… III. ① 上海市—
地方史 IV. ①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8876号

《Histoire de Shanghai》by Marie-Claire Bergère
World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2.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3-906号

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

著 者：[法] 白吉尔

译 者：王 菊 赵念国

特邀编辑：方小芬

责任编辑：李 慧 唐云松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毫米 1/16开

印 张：24.75

插 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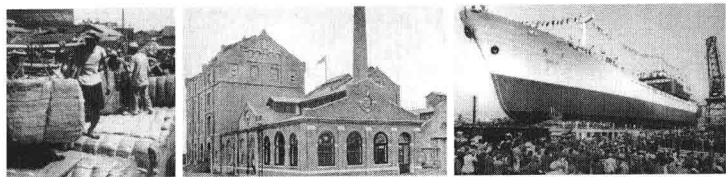
字 数：425千字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528-8/K · 235

定价：5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FOREWORD

张仲礼

记得第一次与白吉尔教授见面是在1979年。当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组织代表团来华访问，旨在促进中法两国的科研合作交流。出于对上海史研究的执著，作为代表团成员的白吉尔教授毅然脱团一天来我院访问。黄逸峰院长即时组织了接待性的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法语翻译，我还临时充当了英语翻译。座谈结束后，我和白吉尔教授在一个小型院长办公室专门交谈了半小时，就双方当时研究的课题作了交流。我告诉她，我正在根据现存的公司档案资料主编一套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我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税税率的确定是中外双方协商、根据外方的要求而定，故被称为“协定关税”。就烟税而言，实际上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直至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烟税是中方根据英美烟公司的要求而定，故应称为“协定烟税”。当时白吉尔教授还很年轻，她对能够得到73岁高龄的黄逸峰院长兼洋务运动研究专家的接见，以及年近花甲的《中国绅士》作者和企业史专家（1990年代转入专门研究城市史）的我相识，表示非常荣幸。从这次座谈会开始，白吉尔教授就成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常客。我从1984年开始任我院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1987年转任院长，1999年始任顾问。在此期间，我一直有幸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接待白吉尔教授。我们因此成了好朋友，白吉尔教授也逐渐被西方同仁尊封为“上海人”。现在，体现这位“上海人”多年研究成果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的中译本即将出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

正如白吉尔教授在前言中所叙，自1957年首次访华后，上海就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座城市丰富多彩的历史深深吸引了她。此后，她访问中国至少达15次之多，基本上以上海为目的。多年来，围绕上海史研究所牵涉到的一系列问题，她对中国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等专题都作了深入研究，并陆续出版了《中

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孙中山》等在国际汉学界和中国学界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专著和数十篇相关论文。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白吉尔教授饱读世界汉学家和中国学家有关上海史研究的论著和各类资料，包括各级研究生的论文，精心钻研法、英两国外交部保存的历史档案，终于把常年积累的心得和观点付诸《上海史》一书的字里行间，以飨读者。

关于《上海史》的主题思想和各章的内容结构，该书的前言中已有精辟的归纳和言简意赅的描述，我无需多费笔墨了。在此，我想谈谈阅读该书后的感想。

近年来，由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重新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特别关注，上海史研究也成为国内外汉学界和中国学界的研究主题之一，出版的专著和论文日益增多。然而，近50年前就起步研究上海史的白吉尔教授，在她的专著中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鲜明特点：

第一，强调了促进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上海具有现代性，而不是单纯的现代化。从语言结构来看，中文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只是一字之差，外文也只是后缀不同而已，但这两个词的实际意义相差甚远。现代化只是表面上能看到的東西，比比皆是的高楼大厦、高科技产品等都是现代化的表现，但这并不表示拥有这些实物的城市和个人都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现代化在思维和行为上的体现，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联想到今天的中国，在同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上海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是全国金融、经济和工业的龙头。最明显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她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远远超越了比她早开放的南方经济特区。有人说是上海的基础好。好在什么地方？白吉尔教授画龙点睛般地指出，好就好在上海和她的居民具有现代性。

上海居民的构成决定了这个城市的特点。除了老城厢居民圈外，上海称得上是个移民城市。为了生存和发展，上海人富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接受西方人带来的思维和形式，把它们吸收消化，并转化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犹如橘过了淮河便成枳，外国经验到上海后也走了味。这座城市虽然存在着外国租界，华洋杂处，但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城市那样丧失自我。她向全中国做出示范：何为洋为中用。在这里，古老的中华文明和西方的现代文化的相撞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因为这里涉及到的主要对象是中外双方的商人和冒险家，他们希望的只是尽快地把各自的谋利手段合法化。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些接连不断的撞击中，上海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现代性逐渐融入了她的肌体。纵观上海史，上海人以其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经验来对抗

西方以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进步为主体的挑战,即以现代性来迎击西方。这座全中国最洋化的城市——“东方的巴黎”,也是民族意识最早觉醒、革命动员最为广泛的地方。她搭建了东西方思想交流的平台,汇集和包容了各种新生事物,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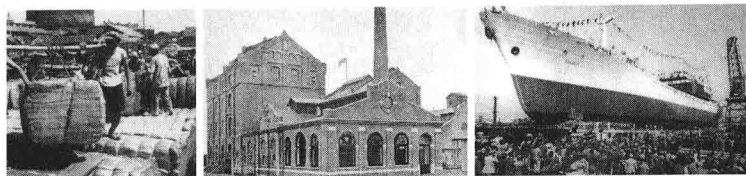
第二,在肯定租界的殖民地性质的同时,强调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尽管租界是近代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但它们对现代化上海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由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档案已经整理开放,我们对该租界的认识正在深入;而法租界的主要档案仍未公开,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扰,因此白吉尔教授对法租界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当时各租界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工部局的事务由公共租界当局自行处理,公董局的行政则直接受制于远在巴黎的法国当局;英美推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法国崇尚的是1789年大革命以来共和政治的文化价值观,在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同时坚持整体利益原则。以具体史实为例,当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开始运作时,工部局决定向那些交得起费用的人供应自来水,交不出的免谈;而法租界是由公董局出面向英商购水,然后通过公共水龙头向租界内居民免费提供用水,包括中国居民在内。

如果说公共租界给上海带来了市场观念、资本运作、现代科技和企业管理等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法租界则提供了市政管理、城市建设、宗教保护和公共利益等典型的官僚主义统治样本。因此公共租界能够在外滩建立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和创设了诸多现代工厂企业,而法租界这个在商场上不算合格的学生却能造就更为优越的人文思想环境和海纳百川的文化性格。就上海某些现象而言,比如海派文化,是否曾受到法租界思想环境的影响?

第三,作为西方汉学家,白吉尔教授研究上海史的着眼点和中国学者不同,她从租界史切入,以点成面,逐步了解整部上海史。她肯定了上海人在这座城市发展中杰出的贡献,同时也提醒不要疏忽那些曾经把上海当成家园来建设的外国移民。尽管这些外国人成分复杂,出发点各异,但他们确为城市尽过力。白吉尔教授的专著显示:与公共租界相比,法租界公董局的所作所为似乎更加“无私”些。他们把上海的租界当成法国的属地来管辖,完全套用法国式官僚主义制度,连租界的行政年度预算都由巴黎规划制定,由外交部直接派发。为了改善生活环境,租界内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市政建设。这些费用也由公董局负责筹措,不足之处可向国内申请支援。至今依旧存在的原法租界内的道路和公用事业设施,多少能反映出那些外国移民所作的努力。

我认为,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史的研究中,过于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忽视租界对上海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观点是不恰当的;而个别过分肯定租界作用的现象也是值得推敲的。最科学的方式还是像白吉尔教授那样,注重史实,不偏不倚。

白吉尔教授非常乐意地接受了“上海人”的尊称,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把自己当成了上海人,真切地关注着正在上海发生的一切。衷心希望她的新著能够进一步促进上海史的研究,与我们携手共进,为上海史研究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文版序：从远方遥望上海

向中国的民众尤其是上海的读者叙述描绘上海的今昔，对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来说似乎有些过于大胆，甚至有些可笑。谁还能比那些从父辈、祖父辈起就和这块土地存亡与共的市民更熟悉和理解这个美丽的大都会呢？我在远方由衷地热爱着她，曾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进行短促的参观访问；我在繁冗的档案中寻觅她的足迹，探讨她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到间接的经验和感受：一个研究员的结论，而不是目击者的见证。相比那些缔造这个城市和分享她的居民的共同命运的参与者的体验，一切来自于外部的关注点都可能显得不太恰当。由此，投向一个中国都市发展过程的所有的非中国人的目光，也同样可能被视为看不到问题的关键，即演变中巨大的文化活力和适应力。因此，我必须接受一些读者的批评，因为在本书中找不到与他们的经验相应的共鸣，也找不到与他们心目深处保存的上海的印象相符的重影。

然而，所有的过错都有权申辩。在这里，我试图说明的是，排除了感情色彩的目光，可以对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的人们有直觉认识；把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和她的研究目标隔开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距离，允许她对上海的现实和真实性有另外一种视觉，即与具体事实给予的即时感知有所相异的想法。当然，不是说更好，仅仅是不同而已。

本书最初的写作对象是那些不太了解上海史的西方读者，所以对于部分熟知上海的中国读者来说，有些章节可能显得平淡无奇。但是，不寻常的视角还是可以充实或改变他们的观点，使他们看到一些没有提出过质疑的部分。

以帝国主义为例。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海历史上，条约制度和外国租界的存在烙下了深深的痕迹。除了对帝国主义应负的责任所作的历史和道德的判断外，上海人和外国人对这事实本身的认识似乎彼此分歧。

对上海人来说,外国租界是受制于非中国人的权力机构管理和影响的居住区,它们被排斥在中国人的城市社团之外,或者被摒弃在城市和社会的边缘。这些地区从这种社会遗弃中汲取了他们的特异性和统一性。尽管租界在城市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当地的中外精英在那里接触和联系,然而对于全体居民来说,租界就像是大陆上的一块未知空间,其特征类同。对租界的认同是否定的:它们不是中国人的居住区。它们的作用是帝国主义的服务工具和帝国主义的象征。

正是在租界这种表面的相似下,反差无所不在,例如在公共租界的商人寡头势力和法租界雅各宾派的官僚主义之间。前者与他们企业的繁荣休戚相关,后者注重宣布他们的重大原则,并时而付诸实施。至于外国人社团内部的不协调,表现在天主教徒对抗耶稣教徒,深谋远虑的领事反对急功近利的商人,谨慎强制的外交官抑制时刻准备要求宗主国军事干预的侨民。

所有这一切,当时的中国人很少关心。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蛮夷”之间的争端和纠纷,与他们的社会无关。而当代的历史学家则不能不在意。因为这些争论对决定城市的命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1854年,海关外国税务司在上海的开设使英国领事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因为一些英商和别国领事都想利用太平天国起义来取消海关税的缴付。同样,1927年4月,与英国领事借助武力的立场背道而驰,法国领事采用了极为灵活的外交手段,为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突然袭击提供了便利。

请不要误解。我丝毫不想把上海史纳入租界史,犹如西方历史文献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我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些半殖民飞地的历史归并到它们宗主国的历史中,恰恰相反,我想使它们重新融入当地的历史。目前,上海利用她继承的丰富遗产,从当年在她土地上风行的形形色色的外国影响中吸取精华。今天上海的现代性赋予她许多特征,她的效率和魅力——科学技术发明的志趣、经营管理的能力、优美精致的建筑和服装设计意识——在前租界提供的范例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仍然是“非中国”模式,但已经面目全非,与原型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引用另一个例子,比如精神和道德的西方化。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民族主义者为此感到如此的痛苦,它和作为他们的根源甚至他们的身份认同的传统文化的防卫联系在一起。这场争论仍保留在议事日程中,但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它渴望一种新的衡量尺度。相互作用的文化观念逐渐趋于取代文化适应。这意味着基于文化原型上的相互影响和设置新的形式。从这个角度考虑,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上海文化,海派,没有成为纯商业文化。为了成为独特的组合和

中西文化的革新者，她被同时代人所蔑视，认为她既不忠实于她的中国起源又低劣于她的西方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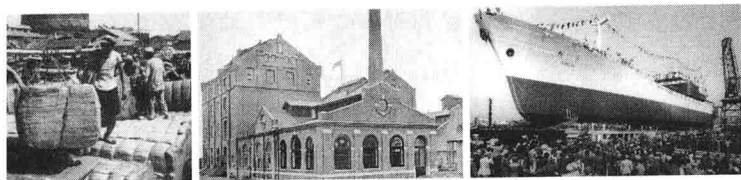
本书还试图采取另一种观察角度，即着眼于漫长的时间跨度中的变化。本书的记叙涉及到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它力图在短短几百页中，汇集概括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其他中外大专院校持续20多年的研究成果。因此，与作为研究基础资料的专著相比，书中的分析难免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但是我的目的是要强调在城市演变过程中，导致这种持续性和统一性的重要因素。沉浸在当地的生活中，日复一日，多方面研究的综合目标集中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经济、社会、文化或政治——上海史显得极其复杂。它经历了激烈的和对立的历史插曲和片断：被迫开埠、太平天国起义、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以及革命运动、国民党独裁、日本占领，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然而，从远处观察，在异地遥望，这部剧烈动荡的历史似乎由一种定式操纵着，一种超越一切的寻觅，即追求现代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不同。现代化是指变革的过程，是动态的过程，结果不能预料；而现代性是指由现代化及其成果所唤起的相应的精神状况和思想面貌。自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投入了现代化进程，而上海的先进使她很早就走向现代性。从19世纪末起，上海的精英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产生了进行适当的变革的观念。随着这种改革的逐步实现，城市居民中的大量民众被所获得的成果和开阔的前景所吸引，集聚到它的周围。上海没有等待现代化的强行降临，她从一开始就被其中的现代性所吸引。随后，她在革命运动和内外战争中，以及从外国人那里继续学习。虽然她对外国各种影响开放，然而并没有抛弃置身于其中的传统，相反，利用传统为新的目标服务，使之与改革中的新事物取得和谐。自19世纪以来，上海现代性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往往与国家机器无关，偶尔与它对抗，难得与它和解。她位于长江出口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或者说她在南方的“原始”资本主义和北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之间充当的中间人和协调者的角色，是当今上海的优势；而上海优势的奠定，应归功于她创造的中国式现代性。



(玛丽·格莱尔·白吉尔)

2005年5月于法国巴黎



中文版再版序言：十年之后

自本书法文版问世以来，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上海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获得的成就远非一篇简短的序言所能概括。因此我们顶多只能自问，上海的发展仅仅是遵循了最初设计的官方参与引导的复兴轨道，还是展现了新的雄心和宏图，开发了新的道路。

最明显的事实是：在这新的十年中上海保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率，直至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以外销和投资为基础的模式失去活力，并且抑制地方甚至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这种快速增长的节奏在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换届后仍旧维持着。此两位在出任中央首脑之前都曾担任过上海市政府领导，他们在北京继续支持上海的发展，坚信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沿海地区的先行和飞跃。然而接任的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则期待各省市的进步和谐一致，授予内地优先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持久增长可能会导致意识形态决定的政治定向（重振农村和贫穷中国的愿望）所产生的影响和上海的奔放所带来的经济变化之间的某些分歧；更有可能，她的持续增长说明了尽管她的支持者不再出任最高国家领导，但其影响力仍然如旧。

新世纪唤起了上海的新抱负。1990年代期间，在复兴的迹象中追回了改革过程中某些迟缓的上海继续突飞猛进，借鉴昔日资本主义和国际大都会的经历重新崛起。21世纪边缘的上海不再渴望重振以往的雄风，而是决心成为全球城市（global city）。

荷兰社会学家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于1991年采用了“全球城市”这个概念^①，此后即被大量引用和普及，在失去其精确性的同时融合了各种定义。该概念最初涉及的是某些城市，她们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配备齐全、充当全球化的领军人物、筹划组织商品、资金和信息的流通，聚集决策者主宰国际分工。渐

渐地,其他标准加入其中,如文化的威望和影响以及城市面貌的现代性和吸引力,旨在烘托该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的能见度。参照标准中的这条或那条,上海被分别列入全球城市排行榜的第八位或第二十一位^②。因此,竞争尚未完全获胜。大多数全球城市出自发达国家,长期居高临下处于优势地位,比如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很难符合这些要求,但是上海则发挥了极大的正能量,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此我们凭借对人口、交通和文化设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见证这些惊人可观的创造和成就。

上海继续不断地吸引着新移民。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上海居民总人数达2 302万,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③。这个突破并非源于自然增长,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已经降低了出生率,这是临近几省民工大量涌入的结果。目前这批长期居留的民工人数约达900万,是十年前民工总数的三倍。另外,上海接纳越来越多的来自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的外国人。根据官方统计,2009年按规定合法登记的共有15.2万人。毫无疑问,更多外国人没有统计在内。在因公到沪出差的海外公司的雇员中,一部分人倾向于长期居住上海,供职于地方雇主:犹如20世纪初的“上海滩人”,前来利用城市提供的致富机会。他们正在成为上海人,分享因经济奇迹暴富的部分上层社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几十万台湾企业家和商人之外,又增添了他们的存在。观察中国各省、亚洲地区或者全世界来沪定居的人数,今天上海的居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国际化。

为了适应人口暴涨和经济增长,上海实行飞速城市化的政策,配备了极为出色的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交通网络,致力于便利市中心与新区之间、城郊居民点与邻省边缘区之间以及与大陆腹地之间的联系。

单位分房的终止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该市场于2004年向国外投资者开放,并且成为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尽管投机的泡沫反复出现。市中心的重建伴随着城市外围新住宅的铺展:住房政策似乎也是迁徙政策。仅仅在1991至2000年十年间,市中心360万平方米的住宅被夷为平地,市府预测在未来的十年间还将推倒1 000万平方米的楼房。随着该政策的执行,大量居民的迁移也相应而生,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被净空的市中心将由气派十足的大厦所占据,用作宾馆、办公楼和豪华住宅,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移居到至今尚未完全城市化的城郊边缘地区。为了把新建社区融入城市范围,方便市民日常交通和协调整体布局,地铁、轻轨、桥梁和高速公路日益增多。

大都市的轨道交通线从2000年的3条增加到14条,长达538公里的铁轨沿线设置了329个车站,并且轨道还在继续延长,2020年将增至20条地铁线。每天

有700至800万乘客推推搡搡、相互拥挤在地铁车厢内。上海还部署了12条快速道(穿越浦西旧城区路段常常采用高架形式)和4条环城大道,最外围的绕城高速公路包裹以前的村庄和地区乡镇,如奉贤、松江、青浦、嘉定,把她们带入了城市的怀抱。轨道交通和公路网络离不开众多的技术工艺作品:隧道和桥梁。1990年代3座跨越黄浦江连接浦西和浦东的大桥又增添了新伙伴,例如卢浦和闵浦。2011年,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启大桥竣工,连接了崇明岛和江苏省。大桥的外形宏伟壮观,桥拱跨度400至600米不等,固定大桥的支柱高达150米或200米,强化了上海的新景观。远处,两座跨海桥梁为科技壮举提供了范例。2005年,长达32.5公里的东海大桥通车,直达上海新建的洋山港。此后修建的横跨杭州湾的大桥比前者更长,大大缩短了上海与浙江主要经济中心之一的宁波以及与东海岸之间的距离。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创立加速了各种交通网络的一体化。地处市区西部,置身追赶都市化进程的近郊,虹桥机场自1999年大部分国际航班迁至浦东新机场后,主要接待国内航班,但她并没有因此停止发展。2010年设置新航站楼后,她每年能够迎接4000万旅客。临近机场的是上海南站,专供动车和高铁使用,通往北京、南京、杭州等全国各地。地铁2号线连接虹桥机场和南站,并直通浦东新机场。

向大陆内地最大限度敞开大门的同时,上海也成为更加容易接待外国游客和货物流通的港口。自1999年起,浦东机场持续扩展,现在每年能够迎送旅客6000万人次,处理货物能力超过400万吨。运行十年来,磁悬浮堪称为壮观的创举,只是它没有实现所有的允诺,机场和市中心之间的连接还得依靠地铁2号线来确保。总之,上海近来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港。惊人的吞吐量达2900 TEU(国际标准20英尺集装箱计算单位),她的活力超过了新加坡、香港或鹿特丹。新建立的洋山深水港坐落在上海东南的杭州湾,2001年开始动工。她弥补了外高桥港区的不足,后者位于长江口,航道不够深,无法容纳大型集装箱货轮。面对茫茫大海,洋山港是上海向全球开放的象征和工具。

我们可以继续追踪和枚举上海经济领域内取得的成果,各部门日益增强的功能带来了不仅是数量上而且也是质量上的进步,2012年产值占地方国民生产总值的60%;或者叙述教育研究事业的飞跃;或者描绘该城市和世界政治舞台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外国领事馆和各类机构的倍增以及国际性会议的频繁召开就是见证。然而,一个城市在世界排行榜上的升级需要她善于展示其成就,需要改造现实,需要懂得为自己塑造众人接受的形象,需要以其注目的先锋派发展风格震惊世人。关于这些,上海正在全力以赴。

城市前景的变革从3座塔楼的建立找到了完美的概括，它们跻身于世界最高建筑排名榜，俯视着陆家嘴金融中心的摩天大楼。金茂大厦于1998年落成，邻近又增添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即将竣工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高达632米，嵌套了9个圆柱形部分，由双层玻璃墙团团围住。这栋塔楼具有象征性意义，她代表着一个面向未来、随时准备适应世界文明变化的大都市的活力。

上海致力于开发和整理历史建筑遗产。自1990年代起，重振外滩和复兴前法租界地区的工作持续不断。这些建筑属于当年现代主义繁荣的一部分，坐落在于为在国际文化市场占一席之地而努力的大都市，授予该城市独特性标记，以其先驱建筑区别于其他，重点在于和现代艺术、生活方式、时尚、运动及旅游相一致。为了创建城市的新面貌，上海召唤全球著名的建筑师前来比武，各大洲英才济济满堂，诸如歌剧院和世纪大道的设计者让-马里·沙庞提耶(Jean-Marie Charpentier)，名字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连在一起的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兴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美国KPF建筑事务所，承建外滩金融中心的福斯特(Foster)及其合作者，设计上海东方体育中心的德国GMP建筑事务所，等等。50多个国际公司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与新一代的中国建筑师、工程师携手合作。

博物馆系统并不属于中国传统，历朝历代都由皇上和富官们悉心保存艺术作品。但是，一个全球城市不会放弃作用重大的博物馆。上海已经拥有一座于1997年开幕的漂亮的博物馆，向公众展示国家收藏的青铜器和古代艺术作品。在新的十年中，应现代特色之需求上海又开设了好几个当代艺术博物馆。2012年，设立在世博会中国馆内的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对外开放。跟随西方国家促进改造工业废址为展览场所的时尚，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建筑在浦西19世纪末的南市发电厂遗址上^④。

受惠于这些类似名片的成就，上海致力于增加其知名度，融入世界文化事件。因为这里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水泥、玻璃和钢筋，新建大楼与大规模的商业文化运作联系在一起，中外演员常常自愿亮相或者应邀出席这类活动，诸如大旅馆的落成典礼，音乐会和戏剧、演出，两年一度的当代艺术展，一级方程式赛车，2011年世界游泳竞标赛等等。每一参与都利于促进上海成为国际文化中心。

2010年组织世博会是这些形象活动中最重要的一次。昔日位于外滩以南黄浦江沿岸的工厂和仓库所在地的人口被彻底清空，重新调整设置了76个国家馆，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馆。世博会的召开是投入、加速和调整上述大型工程的机会，目的在于呈现城市的最佳形象，让全世界赞美上海的技艺才能和礼仪教养。世博会成功了，打破了所有的历史记录：她聚集了192个参与国，数十位外国首脑

和政要出席开幕式,吸引游客7 300万人次,获得投资480亿美金。这是一次上海主持的全球大聚会。

上海是否因此成为“全球城市”?为数众多的成绩并没能避免她的欠缺。为了使人信服中国和上海在长期持久的城市规划中的先驱理念,崇明东滩生态城预定在世博会期间建成,可惜并未如期现身。还有那些城郊周边涌现的“新城”,近似精确地仿造了欧洲的模式:松江的英国城、高桥的荷兰城、法国城、瑞典城等等。这些住宅区普遍存在着缺乏居民的现象,以致人们不时自问空城的意义何在。此外,2013年元月1.2万多头死猪漂浮在黄浦江面,或者是雾霾的反复入侵,虽然没有北京那么令人窒息但仍然导致呼吸困难。还有,2010年一栋30层大楼发生的难以抑制的火灾(造成58人死亡),或者2011年新建的地铁10号线追尾事故(造成260人受伤)。

除了意外事故、火灾、失责或者错误这些现代化尤其是快速现代化过程中固有的现象,上海经营现代化的方式的本身有可能使她在获得全球城市身份时遇到问题,至少是在原创者沙森提出的概念的原意上。沙森认为,全球城市的出现事实上与市场、物流和国际金融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新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支撑着。自1980~1990年代以来,经济调整和私有化的进程与新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同时搅乱了生产和交换组织。这些组织越来越少依赖公共权力的参与,越来越多取决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策略中心的大都市网络的影响,同时充当了世界市场与各类地区经济或国家经济的接口和界面^⑤。

但是在上海,经济活动和城市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依然和以往一样受到国家和市府公共权力的控制。的确,决策的过程公开化了,中外公司企业均被吸收参与制定计划和更新城市面貌的大型工程,不过市府仍旧保持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注意到如果承担资金筹划和实现多项计划的上述公私合作伙伴诚聘外国私营企业参与,中方介入的公司一般都是国营企业。公共权力掌握了工程的控制权,即便他们不是主承包者。尽管某个预定规划的突然改变显示了政府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和措施^⑥,尽管开放某些与市民社会的公开对话(反对声也许是重审磁悬浮延伸计划的原因),最后的话语权还是留给了紧跟中央政权的市政府。

在上海,犹如在中国其他地区,经过各种行政机构长时间和不透明的审核程序后获准的外国投资和金融活动受到许多限制,束缚了对兑换、利率和资金运转的掌握。对上海而言,这些限制代表了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存在着同样多的障碍。

意识到这些不足,市府和中央试图寻找补救方法,于2013年9月创立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包括已经存在的经济特区外高桥保税区、洋山港和浦东机场保税区。该规划的草图自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就开始拟制,一直由市长和市委书记承担责任,得到了中央的坚决支持。2013年新任国家领导人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促进了自贸区的成立^①。由此改革开放进入了升级试验的新阶段,上海应招出任类似1980年代广东和福建经济特区的角色。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重新接手邓小平曾经高举的火炬,这关系到要让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自贸区内,中国私人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允许在以往不能进入或者基本不能进入的领域内自由投资,如银行业、保险业、航运业、旅游业。人民币能够完全自由兑换,利率将放开,网络通信将不再查禁。

上海自贸区正式成立典礼上的公告只是部分回应了这些期待。首批措施之一是市政府宣布了禁止在自贸区进行的活动名单:网咖、新闻媒体或者社会调查等等。相反,置于该名单所列经营范围之外的企业无需申请或者等待(有时得花费很长时间)行政部门的开业允许,只需通知当局即可。但是,没有任何金融自由措施和取消网络查禁的宣告,潜在的投资者表示失望。

给予自贸区精确的定义?很难判断。如果观察1980年代的前经济特区,它们都是在数年内以渐进的分批的方式来实施承担的规划。上海市前市长、现任市委书记韩正认为,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使自贸区正常运转。如果这些预计的改革得以实现,上海完全能够 and 香港或者东京竞争,进入全球城市的行列,打开中国与世界市场更加紧密结合的通道。

然而,众多障碍仍旧可能对如此迅速的进展提出疑问。在中国国内,政界和社会对改革存在着可能的强烈的反对声;在世界各地,对国际经济体系运行越来越多的担心和质疑,使得某些制度执行者、政策负责人和新闻媒体经常表示希望重返由国家和其他决策机构适当调节的经济和金融运作中。

在期待中,上海20年来不懈的努力和发挥的才干已经赋予其前所未有的可见度,使她成为不是严格的概念意义上的、而是更具广泛实际意义上的全球城市。

注释

- ① 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1年。
- ② 参见英国拉夫堡大学《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 2008年上海排名第八位; 参见《The Global cities index 2010》, 载 *Foreign Policy*, Rebecca Frankel 特别报告, 2010年4月15日, 上海排名第二十一位。

- ③ 这是上海市镇人口总数,行政范围包括周边农村。市区实际居住人口约2 060万,占上海总人口约89%。
- ④ 参见建立在火车站旧址的奥赛博物馆,或者由泰晤士河边前发电厂改建的泰特现代艺术馆。
- ⑤ 参见丝奇雅·沙森:《The Formation of Intercity Geographies of Centrality》,载Seng Kuan, Peter G.Rowe 主编, *Shanghai.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 慕尼黑, Prestel 出版社, 2004年, 第8~35页。
- ⑥ 参见Nicolas Douay, 《Shanghai: l'évolution des styles de la planification urbaine》, 载《神州展望》*Perspectives chinoises*, 2008年第4期, 第16~27页。
- ⑦ 参见对上海市长韩正的采访, 载 *The Economist*, 2013年11月14日。



(玛丽·格莱尔·白吉尔)

2014年1月于法国巴黎